

间——20 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学术界》7 期),张兵、张毓洲《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5 期)、许颖《清代行政处分制度研究现状述评》(《西南大学学报》2 期)、赵志强《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概述》(《清史论丛》2010 年号)等。

本年度有一批清史研究的论文集出版,主要有王政尧《清史初得》(辽宁民族出版社)、郭松义《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中国农业出版社)、张研《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陈峰《清代财政史稿》(商务印书馆)、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 30 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中华书局)、(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中华书局)等。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相关成果和动态详见各期《清史研究》中的专栏和“中华文史网”中的相关板块,本文不再重复。由于写作范围和角度的局限,本年度许多优秀的清史研究成果未能及时收录,敬请方家批评指正。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全体同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 关于冯友兰“照着讲”和“接着讲”方法的研究综述

刘恭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0102)

冯友兰先生是 20 世纪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我国近代哲学、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冯先生一生不仅进行深入的哲学研究,而且时刻关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建设,先后提出了“释古”的方法、“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思想等一系列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极具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冯先生关于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新的基本方法,也是冯先生自己数十年研究工作所贯彻始终的方法。本文将对学界关于这一方法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

### 一、“照着讲”和“接着讲”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

“照着讲”与“接着讲”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冯友兰创立新理学之初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对概念,他在《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

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但何谓“照着讲”和“接着讲”,冯先生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冯先生才加以申论,但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随后又经冯学研究者引申发挥,才成为理论较为完备的方法论体系。

学界有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照着讲”是哲学史研究的方法,“接着讲”是哲学创新的方法。蒙培元就是此说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冯先生提出哲学史研究要“照着讲”是与其哲学史观密切相关的,因为“‘本来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所以,“‘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或说出来)。虽然‘写的’的哲学史与‘本来的’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的’哲学史写的”。“接着讲”则不同。“接着讲”作为哲学创新的方法,要“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的东西的产生”(蒙培元:《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

朱伯崑也说:“‘照着讲’是哲学史家或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接着讲’则是哲学家的任务。”“照着讲”就是“历史的叙述”;“接着讲”则是“哲理的阐发”(朱伯崑:《“照着讲”和“接着讲”——芝生先生治学方法浅谈之一》,载《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高秀昌对“照着讲”是哲学史家的任务这一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冯先生晚年将哲学史归为“照着讲”是在“哲学史家的工作主要是陈述性的,其任务是寻出过去哲学家的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这一意义上说的。根据《新理学·绪论》中“哲学家是自己有真见者;注疏家是自己无见,而专转述别人之见者”的提法,他认为冯先生“是把‘照着讲’看成是注疏家的讲法”的。高秀昌指出,“从哲学史理解及历史的叙述看,哲学史家固然要以客观的、中立的立场,同情了解的态度,对以往的哲学作不增不减、不偏不倚的叙述,以求再现客观的、真实的哲学发展史;而从哲学理解及哲理的阐发看,要真正理解和准确把握以往的哲学,哲学史家也必须有自己的哲学之见,以便对以往的哲学作深入地批判性阐释”。后者不是“照着讲”所能概括的。所以,“‘照着讲’只是哲学史家的部分任务。因为哲学史家的任务是历史的叙述和哲理的阐发的统一,是哲学史理解和哲学理解的统一”(高秀昌:《“接着讲”——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

以上三位先生都认为历史叙述是哲学史家的任务,高先生之所以和蒙、朱两位先生观点不一致,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作为一个哲学史家,是否应该进行哲理阐发存在分歧。蒙先生和朱先生不是否定哲理阐发的意义,他们只是认为,哲理阐发不应该在哲学史研究中而应在哲学创作中进行(朱伯崑:《略论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从冯先生《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文来看,蒙先生和朱先生的观点更符合冯先生的原意。冯先生在该文中提出六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分别是: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之哲学。其中最后一步,评述哲人之哲学与哲理阐发最为相近,但区别更明显。“评述哲人的哲学”即“述学”。冯先生给“述学”下的定义是:“用科学的方法、存疑的态度、精密的思想、谨严的文笔,把握哲人的哲学之体系、来源、影响和得失。依次予以描写叙述”(冯友兰:《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68页)。对哲人的哲学体系、本源、影响和得失的研

究虽已涉及价值性评判,但仍称不上有何创新。可见,冯先生并不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要涉及哲理阐发,即“接着讲”。因此,把“照着讲”和“接着讲”分别对应于哲学史研究方法和哲学创作的方法是符合冯先生原意的。

时广东和何云庵合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读方式,即“照着讲”是负的方法的延续,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思维方式,其特色是缺乏开拓与创新;“接着讲”则强调逻辑分析,是充满理性精神的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一个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年9月第3期)。这种解读方法未见有认同者。

## 二、照着讲

“照着讲”是否可能?如果我们认同“照着讲”就是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的观点,那么,高秀昌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提出了“照着讲”是否可能的问题(即哲学史研究是否能做到完全客观的问题)。他说:“严格说来,哲学史家治哲学史不会去依样画葫芦,也做不到不偏不倚,而是在历史的叙述与哲理的阐发中建构着哲学史,并实现对哲学史理解的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家也是在‘接着讲’的”(见该作者前引文)。实际上,几乎没有哲学史研究者,包括冯先生在内,认为“写的哲学史”能和客观存在的哲学史完全一致,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既然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那么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即“照着讲”有何必要的问题。

“照着讲”有何必要?有学者把“照着讲”看成一种保守、抱残守缺、泥古不化、拒绝进步的态度(李慎之:《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载《冯友兰研究》第一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这固然有失偏颇,但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用“照着讲”方法讲哲学,意义相对不高。张汝伦就指出,“照着讲”有两大弊端:一是使得传统哲学真正成了过去的东西;二是没能给当代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提供源头活水(《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对此,冯友兰先生有自己的解答。他认为,哲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及各派哲学的大体轮廓,及其其中的主要道理,均已“布在方策”。此后哲学家的见解,很难完全超出前人的轮廓,因此恐怕不能有全新的哲学。因为没有全新的哲学,所以讲哲学不能离开哲学史(《论民族哲学》,《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多数学者都认同此说,认为“照着讲”的价值在于为“接着讲”做准备。但是,有学者认为,真正客观的哲学史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必严格区分“照着讲”和“接着讲”,将两者融为一体,如宋明理学的做法一样,更为便捷。朱伯崑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哲学史是“不够科学、不严肃的”,这样做“只能造成思想上和学术研究上一些混乱现象,引起好多不必要的争论”。所以,区分照着讲和接着讲很有必要,“在研究哲学史时,要遵循‘照着讲’的原则,不应随意发挥;谈中国哲学,要‘接着’传统讲,即给传统赋予新的时代的意义”(见该作者前引文)。

陈来还指出,“照着讲”对冯友兰先生而言,另一层意义是保持中国性的一个方式(《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与民族化——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念说起》,《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笔者以为,区分“照着讲”和“接着讲”之所以必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不仅在今天可为我们所用,还应留给后世,为后人使用。把“照着讲”独立出来,可以较好地保存传统文化,使之流传下去。加上我们当下的“接着讲”,我们留给后人的就是两份

而不是一份遗产,后人可资利用的资源就更多了。

“照着讲”如何可能?虽然“照着讲”不可能完全客观,但很有必要,那就必须研究如何能够较好地实现“照着讲”。高秀昌的《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对冯先生《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中提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照着讲”方法的研究。在哲学史研究中,最难做到“照着讲”的是对哲理的叙述。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自创生之日起就一直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以西释中”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唯一“合法”方法。一方面,我们看到它的巨大优点,因为“不用西方哲学的思路和语言,在今天就无法将一个思想讲得‘头头是道’”(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但另一方面是,“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无论如何也传达不出读老庄、孔孟时的丰富感受;而且,不管这些概念取什么样激进的、变化了的形式,也还是‘圆凿方枘’,进不到中国古代那个韵味悠长又切近机变的思想世界中去”。刘文勇于是重提黄侃对研究中国学术的基本看法:“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中国文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文学前沿》2008年第1期)。黄侃的方法在今天自然已不可能,但我们确实应当反思:“以西释中”的方法显然存在缺陷,是否可以适当考虑“以中释中”,也就是真正在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这是学界应当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 三、接着讲

接着什么讲?冯友兰先生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而言,可以接着任何一种哲学史讲;但作为一个民族哲学家,只能接着本民族的哲学史讲,用本民族的语言讲(冯友兰:《论民族哲学》,见前引文)。这是哲学的民族性所在。刘东针对那种仅限于某一脉络内部的“接着讲”,指出其“在显出相当的开放和灵活的同时,毕竟也还有其狭隘和独断的一面”,“因为无论打算接续着何种精神传统来开讲,这样的主讲人都已先入为主地设定了,所有的真理都已穷尽于此一传统的基本取向,而后人与时俱进的诠释工作,哪怕再充满灵感和再富于创意,也不过是把真理从以往的隐性推演到应时的显性罢了”。这种研究范围的自我限制实际上是文明的原教旨主义。为了克服“接着讲”的这一不足,他提出“对着讲”的研究方法,就是不同文明相互对照着讲(《“接着讲”到“对着讲”》,《读书》2002年第4期)。

汤一介也认为,中国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的哲学研究“应该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甚至应该‘接着’西方哲学讲”,并指出中国现代哲学至少可以有三个重要的“接着讲”的路径: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西方某种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汤一介:《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文史哲》2008年第2期)。汤先生所谓接着西方哲学讲,意思是在外来文化中加入中国思想文化的因素,使之得到发展,进而成为中国化的思想学说。佛教的中国化就是这一方法成功运用的体现,在中国哲学寻求现代化的今天,这很有借鉴意义。

陈来也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性的文化能包括或穷尽人类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东方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各种一元论的文化观,我们就必须承认,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那么我们在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就

“需要以文化多元主义作为基础”(见该作者前引文)。

笔者以为,我们确实应该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来接纳各种文化。但是,我们不可能接着所有的文化传统讲,也不可能毫无区别地对待各种文化,那么我们又该依据什么来选取某种文化作为接着讲的对象和资源呢?时代问题应该是重要的标准之一,也就是根据解决时代问题的需要来选取接着讲的对象和资源。任何一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都必然有自己的时代特色,不是简单借用传统资源可以解决的。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时代问题更是不可能仅仅依靠接着传统文化讲就能解决的,接着外来文化尤其西方文化讲是势所必然的。但是,时代问题再怎么新,都必然与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统文化必然还有作用,甚至作用更大。在这个意义上说,接着本民族文化讲的重要性还是不能忽视的,更何况还有冯先生所说的民族情感的意义。

如何接着讲?如何接着讲也就是接着讲的方法问题。学者一般从冯先生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中寻找他使用的方法。刘仲林认为,冯先生接着讲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正的方法,即形式逻辑分析方法;二是负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冯友兰“负的方法”反思与重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也有学则认为,冯先生“创立新理学体系的方法,实质上就是一种抽象继承法”(《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蒙培元概括出“接着讲”有两层涵义:一、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运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使之形式化。二、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最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这就是“通天人之际”。其中,第一层涵义,即逻辑化的理性分析,只具有方法的意义,只是一种手段;第二层涵义,即接续和发展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实现其永久价值,才是真正的目的(《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见前引文)。

张汝伦则不是从方法而是从内容方面来理解冯友兰的“接着讲”的。他认为,冯友兰的“接着讲”是针对哲学的内容的。对蒙先生概括的通过逻辑分析方法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观点,张先生表示反对。他通过对冯先生关于新旧哲学的论述的研究,认为,如果说冯友兰主张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话,“应该是中国哲学家用现在的语言重新阐发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自己时代的问题,并将新的经验与原有的哲学结合起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语言应该在逻辑上更加清晰和严密”(见该作者前引文)。

陈来关注的则是“接着讲”在学术思想方面暗含的意思。他指出,冯友兰的“接着讲”“包含了一种学术转型的意义在其中”。如果在近代还有学者沿用古典语言来探讨宋明理学问题,即使他有所创新,也不完全是冯先生心目中的“接着讲”。所以,“在学术思想史的意义之上,冯友兰的‘接着讲’就其具体意义而言,并不能仅仅一般地被理解为‘发展’,它包含着学术‘近代化’的意义,是近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见该作者前引文)。

其他问题。冯先生曾谈及中国哲学的近代化问题。他说:“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

限公司1991年版,第166页)。陈来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即“在哲学领域,仅仅‘利用近代逻辑成就分析说明传统概念’,这就是‘近代化’、就是‘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吗?同时,为什么仅仅逻辑分析地说明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就是‘中国哲学’呢?这与近代化的‘写的中国哲学史’有何区别?在这个方面,冯友兰的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他来说,近代化的‘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同样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说明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见该作者前引文)。

张立文则认为,中国哲学在经过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阶段后,必须开始“自己讲”,“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学中有自己的价值和地位”(《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 小 结

冯友兰“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方法自提出至今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了,学界对它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但它探讨的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仍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其研究方法仍很有借鉴价值。而且,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到“照着讲”和“接着讲”是一个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应该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 海峡两岸郑玄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7月21至23日,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中国周易学会、潍坊报业集团、中共高密市委、高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郑玄学术研讨会在郑玄故里山东高密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山东社科院、山东省委党校、山东地方史志办公室、山东大学、山东经济学院、聊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大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廊坊师院、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东海大学,以及香港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学者围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生平、学术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大连大学葛志毅认为,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诸建构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依据;另一方面应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山东大学杨端志认为,在中国经学文本诠释史上,遍注群经,影响最大最久的是郑玄。郑玄的经学文本诠释,被称为“郑学”。中国文本诠释的类型呈现复杂的层面。从符号学来看,文本诠释的对象,有语言学问题,有思想、哲学问题。山东大学曾凡朝探讨了郑玄《易》学诠释学形成的历史语境,认为郑玄所处的社会历史境遇、“异端纷纭”的学术现实及其立志为学、遍游天下、尽访鸿儒、博览群经的学术志向和人生历程,他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的学习、吸收和研究,决定了他的诠释视野与诠释经典的范围,也决定了他对《周易》的诠释目